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社会联盟理论解析

田野

内容提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为了探究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提出了社会联盟理论。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社会联盟理论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即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路径和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路径。通过考察行业间的要素流动程度,两种联盟分析路径找到了相互汇合的逻辑与经验基础。社会联盟理论以利益分配为基本着眼点,为分析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纷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对比较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国际制度的国内合法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利益 联盟 分析路径

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就一直倡导自由贸易。理论模型表明,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社会福利,避免保护贸易带来的效率损失。但在各国贸易政

《国际政治科学》2008/2(总第 14 期),第 55—80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策的实践中,保护贸易经常取代自由贸易成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优先选择。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了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结果加剧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大萧条”。那么,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后5年,美国政治学家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的研究发现,1930年之所以提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利益集团联合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

沙特施奈德对1930年贸易立法的研究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分析开辟了先河。如果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关于关税保护“在政治上不可战胜”的结论并不准确,他在描绘国际贸易倡导者原本要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方面则找对了目标。自由贸易虽然从整体上提高了国民福利,但其收入分配效应导致了“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不同的社会集团会在利益的基础上分化聚合。这些集团在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领域中表现出冲突与合作的不同形式,从而产生“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根据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融合趋势提出了社会联盟理论,为我们分析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纷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和评估这一学术前沿领域,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社会联盟理论兴起的学术背景如何?它的提出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二,社会联盟理论内部为何出现了两种研究路径,即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路径和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路径?第三,两种路径又是在怎样的分析基础上走向汇合的?

E. E. Schattschneider, *Politics, Pressures and the Tariff: A Study of Free Private Enterprise in Pressure Politics, as Shown in the 1929—1930 Revision of Tariff*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5).

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于少蔚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章第3节;朱天飏:《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章。

一、社会联盟理论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对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之间的隔阂状态感到不满。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71年《国际组织》期刊上编辑了“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专辑,强调跨国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他们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强调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但是无论跨国主义还是“复合相互依赖”,都没有为国际力量与国内力量的互动机制提供概念性的框架。彼得·古洛维奇(Peter Gourevitch)在1978年发表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中,则超越了描述和简单概括的层次,为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这一问题打开了理论建设之路。

古洛维奇开篇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关切:“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传统区分已经终结了吗?”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两个分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着非常不同的视角。国际关系专家有时会关注国内体系,但其目的是解释对外政策与国际政治。在探究国家对外行为的原因时,他们如果不满意纯粹的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解释,才探索国内政治的原因。比较政治学者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探求国内结构的本质。他们为了追寻国内政治的动力,国际体系可能会成为一个解释变量。因此,在比较政治学者那里,“国内结构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原因而是国际政治的结果”。古洛维奇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感兴趣。由于比较政治学者的视角常常被忽视,古洛维奇在文中主要讨论了国内结构如何成为国际政治的结果。

我们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古洛维奇把题目叫做“颠倒的第二意象”。肯

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 Conclu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1971.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 881.

Ibid, p. 882.

尼思·沃尔兹 (Kenneth Waltz) 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对冲突起源的三种意象进行了区分:第一意象是“人性与国际冲突”,即战争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行为。第二意象是“国家与国际冲突”,即从国家的内部结构中去寻找冲突的根源。第三意象是“国际体系与国际冲突”,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原因。显然,沃尔兹的“第二意象”所关注的是国际行为的国内根源,而古洛维奇所讨论的是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即从国际体系到国内结构的推理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古洛维奇的研究内容成了“颠倒的第二意象”。

根据这一研究路径,古洛维奇对作为自变量的国际体系和作为因变量的国内政治进行了概念化。关于国际体系,他提出主要是两个维度对国内政治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国家间权力分配,或者说是国际性国家体系;二是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经济。关于国内政治,古洛维奇认为五个维度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力量作用的结果:具体事件、具体决定、政策、政体类型和联盟模式。由于前三个维度很容易理解,他更多强调了后两个相对复杂的维度。根据他的界定,“政体类型”指的是决策的制度结构、机制、过程与程序,“联盟模式”指的是社会力量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

这样,古洛维奇为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的研究设置了主要的变量关系。一些学者大致按照“国际性国家体系/国际经济——政权类型”的进路,发展了国家主义理论。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堪称这一研究范式的典范。而另一些学者则主要依据“国际经济——联盟模式”的进路,提出了社会联盟理论。古洛维奇本人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正在后一方面。1977年,他就曾发表了《国际贸易、国内联盟与自由:对1873—1896年危机回应的比较》一文,对1873—1896年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国内社会联盟构成进行了透彻的分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Grou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p. 882—883.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析。经过多年的努力,1986年古洛维奇出版了《艰难时代中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回应之比较》一书。而另一位政治学家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在1989年出版了《贸易与联盟: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的》。这两本著作相继问世,标志着社会联盟理论的正式成型。

二、社会联盟理论中的路径分歧

政策需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对外经济政策也不例外。在现代大众政治日益兴起的条件下,只有了解主要社会集团的具体经济利益,才能找到某项对外经济政策的社会支持模式。正如古洛维奇所说,“政策选择最终由政治家来做出。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制度所授予的正式权威。但是,政治领导人必须得到并保持这些制度性职位。他们无论决定什么,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服从于甚至热心服务于无数的工作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当政治家做出选择时,他们的选择受制于动员或保有支持的需要。政治家不得不在官僚、公务员、政党、利益集团领袖和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体之间寻求一致。”

在这一意义上,社会联盟理论对政策支持模式的刻画,离不开对具体经济利益的考察。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国内的社会利益分配越来越深地打上了国际经济的烙印。国际经济联系对国内各集团福利的影响正是“社会联盟理论”的分析起点。因此,国际经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构成了社会联盟理论的微观基础。但令对外经济政策分析者烦扰的是,国际经济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贸易收入分配模型,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和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由于两种模型的假设不同,政治学家不得不在社会经济利益分析的判定上选取其中的一种模型作为自己的微观基础,这就导致了“社会联

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8, No. 2, 1977.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 20.

盟 范式内部出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路径和以行业 部门为基础的路径。

(一) 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联盟分析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由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歇尔和贝蒂尔·俄林提出。因为这一模型强调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的资源中所占比例和它们在不同产品的生产投入中所占比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又被称作要素比例理论。在这一模型中,一个国家供给相对多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少的要素则称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而国际贸易导致了相对价格的改变,所以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正是在这一收入分配模型的基础上,罗戈斯基在《贸易与联盟》一书中为分析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盟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论分析框架。

当国际贸易的风险降低或成本下降时,国际贸易会扩张,比如 1840—1914 年以及 1948 年至今。当国际贸易的风险增加或成本上升时,国际贸易会收缩,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际贸易的扩张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益,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损;而国际贸易的收缩则使一个国家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益,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损。作为一名政治学家,罗戈斯基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财富和收入转移导致了什么政治后果?”

罗戈斯基采用了传统的三要素假设:土地、劳动和资本,并且假设土地与劳动的比例充分揭示了任何国家这两种要素的禀赋。土地与劳动的比例较高,意味着土地充裕而劳动稀缺。土地与劳动的比例较低,意味着土地稀缺而劳动充裕。此外,罗戈斯基将先进国家定义为资本充裕的国家,落后国家定义为资本稀缺的国家。这样就产生了 2×2 列表分析法所显示的四种情况。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际贸易的扩张将会导致以下情况的政治分化,如表 -1 所示。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海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88 页。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4.
这一假设意味着,没有国家在劳动和土地上同时都是丰富的,或者同时都是稀缺的。

表 -1 贸易扩张的政治效应

	土地 /劳动的比例	
	高	低
先进国家	阶级分化： 土地、资本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 劳工争取贸易保护	城乡分化： 资本所有者、劳工支持自由贸易 土地所有者争取贸易保护
落后国家	城乡分化： 土地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 劳工、资本所有者争取贸易保护	阶级分化： 劳工支持自由贸易 资本、土地所有者争取贸易保护

资料来源：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

第一种情况是先进国家土地充裕但劳动稀缺。因为资本和土地是充裕的，资本家、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农业将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因为劳动是稀缺的，劳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抵制自由贸易而寻求贸易保护。例如，1973年以后，美国的劳工组织就成为贸易保护力量的主要支柱。

第二种情况是先进国家劳动充裕但土地稀缺。贸易扩张将会使资本家和劳工受益，而使土地所有者和密集使用土地的畜牧业者、农业企业家遭受损失。无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劳工都偏好自由贸易，而农业集团整体上偏好保护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所有者和劳工会彼此协调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反《谷物法》同盟就是这类政治联合。

第三种情况是落后国家土地充裕但劳动稀缺。在这样的国家中，资本和劳动都是稀缺的，资本家和劳工因此会受到贸易扩张的伤害。而土地是充裕的，农业将会从自由贸易中得益。19世纪末美国的农业集团就通过“平民党”运动来追求低关税目标。

第四种情况是落后国家土地稀缺但劳动充裕。这种情况下，劳工将追求自由贸易，扩张政治权力，甚至可能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将联合起来支持贸易保护、帝国主义和对劳工的政治排斥。19世纪70—80年代，在落后的德国，就形成了容克地主与资本集团的“铁与麦”的联盟。

当国际贸易收缩时，每种情况的获益者和损失者刚好和上面的情况相反。政治分化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贸易收缩的政治效应

	土地 / 劳动的比例	
	高	低
先进国家	阶级分化： 土地、资本所有者争取自由贸易 劳工支持贸易保护	城乡分化： 资本所有者、劳工争取自由贸易 土地所有者支持贸易保护
落后国家	城乡分化： 土地所有者争取自由贸易 劳工、资本所有者支持贸易保护	阶级分化： 劳工争取自由贸易 资本、土地所有者支持贸易保护

资料来源：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12

通过上述理论模型,罗戈斯基清楚地论证了国际贸易带来的变化对国内政治分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由于罗戈斯基采用的是相对精炼的三要素模型,国内政治分化主要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即劳动要素所有者—劳工,资本要素所有者—资本家,以及土地要素所有者—地主、农场主和拥有土地的农民。而古洛维奇、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等另一些政治学家则认为,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属于同一阶级的不同集团之间也会在“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中相互倾轧。他们以李嘉图—维纳模型为工具,提出了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联盟分析路径。

(二) 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联盟分析

李嘉图—维纳模型是在修正李嘉图模型基础上形成的。在标准的李嘉图模型中,劳动是各国产业部门中唯一的生产要素。杰克布·维纳最早提出以特定要素概念来修正李嘉图模型,保罗·萨缪尔森和罗纳德·琼斯对这个模型进行了数学化。与标准的李嘉图模型不同的是,李嘉图—维纳模型中存在着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而且这些要素是特定的,即它们只能被用来生产某些特定产品。因此这一模型又被称为特定要素模型。根据这一模型,贸易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对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影响不确定。显而易见,李嘉图—维纳模型中的收入分配是以行

保罗·克鲁格曼、矛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 37—63 页。

业部门为基础的。

在《艰难时代中的政治》中,古洛维奇以宽宏的历史视野展现了不同部门的社会行为体在“艰难时代”中围绕着经济政策制定而发生的政治冲突与合作。这里所说的“艰难时代”,是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时期。之所以将“艰难时代”作为观察“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的镜像,古洛维奇作了这样的说明:“经济危机导致政策争论和政治敌对。政策生成于冲突之中,政策要求政治。也就是说,对经济危机的回应要求政治支持。为了理解政策选择,我们必须理解产生政策的政治。……当国家经济相互依赖时,危机就是国际性的。没有国家能够逃脱,因为危机是所有国家必须回应的冲击。通过检验国家做了什么,通过观察他们的回应如何变化,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国家自身以及导致它们选择特定政策的因素。”

古洛维奇主要讨论了三个“艰难时代”,即1873—1896年的世界经济危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紧缩。在对这些危机的叙述中,他涉及了这样一些政策联盟:英国反《谷物法》同盟、德国的“铁与麦”联盟、魏玛联盟、美国的平民党和“金本位”民主党联盟、“新政”联盟、法兰西人民阵线、瑞典的红绿联盟。古洛维奇提出,只有对这些历史上的联盟进行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时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即联盟有哪些成员?它们得以形成的贸易条件是什么?它们怎样聚合在一起?其他的组合是否可能?联盟是松散的还是紧密的?

我们以书中对1873—1896年危机中英国和德国政策的分析为例来说明古洛维奇的研究路径。在这次危机中,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大规模的制造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利用从这些产业中获得的利润,英国又发展了庞大的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金融和贸易部门。英国的农业已经适应了国际专业化的压力,以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劳工关心食物的成本,但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劳工也支持自由贸易。1873年危机发生后,一些粮食生产者和钢铁业生产者寻求保护,但他们为支持自由贸易的上述联盟所击败。这样,即使发生了经济危机,英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仍实行低关税政策。英国国内行为体的

Gi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 19.

关税政策倾向如表-3所示。

表-3 英国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关税政策倾向

		工业关税	
		高	低
农业 关税	高		粮食生产者
	低	钢铁制造业者	大多数劳工 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者 最终制造业产品生产者 银行家和远洋运输业者 政策结果

资料来源：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 81.

在 1873—1896年危机中,德国的情况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后发国家,德国面临着英国的激烈竞争。德国的银行业与国际金融、贸易没有联系,而是和国内产业密切相关。德国地少人多,大部分农产品不具有竞争力。这样,由钢铁重工业所主宰的工业和由种植谷物的容克地主主宰的农业联合起来支持贸易保护,形成了著名的“铁与麦”的联盟。而偏好自由贸易的联盟成员则包括出口导向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如化学和电力设备行业)、生产奶和肉的农民、关心食物价格的劳工,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这样,德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都实行高关税。德国国内行为体的关税政策倾向如表-4所示。

表-4 德国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关税政策倾向

		工业关税	
		高	低
农业 关税	高	政策结果 小农	容克地主
	低	钢铁制造业者 重工业工人	最终制造业产品生产者 最终制造业工人

资料来源：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 95.

显然,“在第一次危机中,通过作用于国内行为体,塑造他们的政策偏好以

及他们对冲突和联合的倾向,国际经济在塑造国内政治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古洛维奇的主要分析单位是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社会集团,他称之为“社会行为体”。虽然所有行业都有劳资冲突,但行业之间在对待劳工的态度上有很大不同。例如,高技术部门因其置于国际竞争之中,就与寻求廉价食物的劳工团体结成了争取自由贸易的联盟。重工业者由于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产生了对稳定的强烈需求,因此反对自由贸易。农业集团则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谷物生产者,另一部分是高附加值的食物生产者(他们要使用谷物和其他的庄稼作为原始投入)。在欧洲,后者支持自由贸易,而前者是保护主义者。在美国,前者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后者接受贸易保护。这样,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不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不同行业、部门的松散集合。

与古洛维奇相比,杰弗里·弗里登更加明确地将李嘉图—维纳模型作为考察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工具。在1991年发表的《投资的利益:金融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政策的政治》中,弗里登依据李嘉图—维纳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但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不同,弗里登的框架集中关注资本跨国流动的分配含义,并根据资本流动的程度考虑不同经济政策的分配含义。

一般而言,国际资本流动包括国际间接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两个部分。就国际间接投资来说,当国家允许金融资本跨国流动时,金融资本离开回报率较低的国家而进入回报率较高的国家。在输出资本的国家,利率会上升;在输入资本的国家,利率会下降。利率的变化不仅会影响金融资本的所有者,而且会影响借款者。据此弗里登提出,资本输出国金融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输入国特定要素资产所有者的境况将会变得更好,而资本输入国金融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输出国特定要素资产所有者的境况将会变得更糟。如果资本流动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发达国家金融资产所有者,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所有者,另一方面不利于发达国家本土特定要素的所有者,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本土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弗里登对于国

Grou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 24.

Jeffre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 439.

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也进行了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在李嘉图—维纳模型的视角下,一个关键变量是资产的流动性或特定性。当投资者的投资涉及大量不同经济活动时,他所拥有的资产很容易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在这个意义上,资产多样化的公司具有较少的特定性和较多的流动性。因为运作于不同情况的多个国家,跨国公司在偏好上类似于拥有多种流动资产的投资者,而不同于国内特定部门的公司。

国际资本流动上的这些利益歧异导致了金融一体化力量和反金融一体化力量之间的冲突。但在开放经济时代,国家一般不会采取直接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这种冲突就往往转向了汇率政策。弗里登认为,在汇率问题上有两个相关维度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汇率灵活性和汇率自身的水平,表-5反映了资本跨国流动条件下不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

表-5 资本跨国流动条件下不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

		汇率灵活性与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程度	
		高	低
汇率水平	低	进口竞争型可贸易部门商品生产者	出口导向型可贸易部门商品生产者
	高	不可贸易部门商品和服务生产者	国际交易商和投资者

资料来源: Jeffrey Frieden, "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 p. 445.

第一个维度主要反映在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上。根据蒙代尔—佛莱明模型 (Mundell-Fleming model),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固定汇率制和国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能同时存在。固定汇率制对于两类社会经济行为体即国际交易商和投资者、出口导向的贸易部门商品生产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他们的经济活动直接卷入国际贸易和支付, 并因此对汇率市场波动高度敏感。由于他们在国内经济萧条时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两类行为体并不关切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而另两类行为体—不可贸易部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进口竞争型可贸易部门商品的生产者宁可牺牲汇率的稳定性, 也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他们为国内市场而生产, 因此高度关切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又因为他们的生意没有涉及外汇的使用, 货币的波动对他们至多有间接

的影响,这两类行为体并没有对汇率稳定的清晰偏好。据此,弗里登提出,跨国公司和国际导向的可贸易部门商品生产者将更偏好货币的稳定,而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和进口竞争可贸易部门商品的生产者更希望保持国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在第二个维度上,一些行为体偏好高汇率,另一些行为体偏好低汇率。弗里登认为,可以通过追踪货币贬值或升值的相对价格变化,来预期经济部门的利益。从具体的分配效应看,汇率越低即越贬值,可贸易商品相对于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就越高。这当然有助于可贸易部门商品的生产者,而不利于不可贸易部门商品的生产者,因为前者产出价格的增长多于他们所使用的不可贸易商品投入价格的增长。根据这一原理,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偏好弱势货币,因为弱势货币使他们的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而不可贸易部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偏好强势货币,因为货币升值提高了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可贸易部门商品在国内市场的相对价格。国际交易商和投资者也同样偏好强势货币,因为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海外资产。

三、社会联盟理论中的路径会合

作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交融的重要理论成果,社会联盟理论为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国内政治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分析路径。古洛维奇、罗戈斯基、弗里登等学者为这一范式的创立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在以行为体利益与偏好为基础的分析视角、以社会联盟构成为中心的分析对象、以国际经济局势为自变量的分析框架上,他们的著述共同体现了社会联盟理论的基本特点。但由于对国际经济联系的国内分配效应采用了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他们对社会联盟形式的分析大相径庭。罗戈斯基依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强调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盟,而古洛维奇、弗里登则基于特定要素模型突出了以行业/部门分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 446.

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盟。

作为两种分析路径的提出者,罗戈斯基和弗里登分别为自己的微观基础进行了辩护,对对方的微观基础进行了批评。罗戈斯基认为,针对特定要素模型的挑战,有三点值得强调。第一,即使是特定要素模型的倡导者,也没有质疑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长期看是成立的。特定要素模型只是描绘了一个“短期的例外”。第二,很多研究显示,这种“短期的例外”将会越来越少。在国内,资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更多的流动性,劳工将有更频繁的迁徙和职业改变,土地的用途也会发生变化。第三,哪个模型更具解释力只是一个经验问题。罗戈斯基找到的证据显示,历史上基于贸易问题的联盟形成更支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而不是特定要素模型。

针对罗戈斯基的上述观点,弗里登提出了直接的批驳。他认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预测长期经济趋势上是有用的,但它并不是一个分析国际要素流动的分配效应的好方法。原因如下:第一,这一模型对所涉及的要素的数量相当敏感。预测可以基于两种要素直接做出,但是当要素的数量多于两种时,预测将变得模糊不清。第二,它假设资本、劳动和其他要素在一国范围内能够毫无成本地从一项活动上转到另一项活动上,即使这些要素在国家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个假设当然是不真实的。虽然从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可以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但是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政治分析是在短期或中期的时间框架内进行的。第三,经验证据显示,政治行为、特别是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政治行为与其说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不如说是以部门分化为基础的。

从弗里登与罗戈斯基的辩论中,不难看出他们都承认对方应用的模型在局部范围内是有效的,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适用于长期趋势的分析,而特定要素模型适用于短期情况的分析。但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当面对某一具体的国际

古洛维奇在他对三次危机的分析中,也涉及到了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情况。但他更多地是以部门、行业为基础的。在提出对政策选择的解释框架时,他明确指出:“很多文献讨论了非常大的集合体(劳动和资本)或者非常小的集合体(个人和公司),而我所关注的是中等的集合体(部门)”。参见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 55.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19.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 436.

化压力时,国内行为体究竟是以阶级为单位采取集体行动还是以行业/部门为单位采取集体行动呢?由于时间框架对解决这一问题无能为力,弗里登与罗戈斯基仍各执一词。而詹姆士·阿尔特 (James Alt)和迈克尔·吉利根 (Michael Gilligan)在 1994年发表的《贸易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要素特定性、集体行动问题与国内制度》中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思路。他们引入了两个变量,即集体行动成本与要素流动性。这样就产生如表-6所示的四种情况。

表-6 要素流动性和集体行动的成本对联盟形式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成本	
	高	低
流动要素	蔓生的搭便车 无贸易政策联盟	阶级联盟
特定要素	行业联盟	多个利益集团 积极的消费者 特定与流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联盟

资料来源: James Alt and Michael Gillig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ing States: Factor Specificity,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effrey Frieden and David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 339.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素是流动的,但集体行动的成本高。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本高,要素所有者将缺乏足够的动力去采取政治行动来影响贸易政策。“搭便车”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政治行动。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就没有联盟形成。例如,在资本充裕的国家,一个行业的劳工将会期待其他行业的劳工争取保护,结果没有任何行业的劳工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游说活动将不会发生。

在第二种情况下,要素是流动的,集体行动的成本低。要素在部门间可以完全自由流动,意味着稀缺要素和充裕要素所有者之间会发生政治分化,

James Alt and Michael Gillig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ing States: Factor Specificity,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 No 2, 1994.

即阶级分化。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本低,阶级成员没有“搭便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罗戈斯基所预测的,政策网络上会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联盟。

在第三种情况下,要素是特定的,集体行动的成本高。由于大集团严重的“搭便车”效应,消费者根本不会形成社会联盟,从而排除了公众对贸易政治的普遍参与。由于集团规模较小,单个行业会寻求对他们产品的保护。因此,贸易政策会被寻求保护的特定利益集团所支配。这种情况是符合特定要素模型的。

在第四种情况下,要素仍然是特定的,但集体行动的成本低。如果单个行业寻求对其产品的保护,消费者会对此加以反对。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本低,任何消费者都不会“搭便车”,而是根据其利益需要积极参与贸易政治。这样,一个争取保护的行业只有在联合其他争取保护的行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但这样的联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其他行业的保护成本很可能高于保护本行业所获得的收益,这样与接受自由贸易的情况相比,所有受保护行业的情况可能变得更坏了。阿尔特和吉利根据此认为,这样的联盟是内在不稳定的。

这样,阿尔特和吉利根运用了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使社会联盟形式的选择问题在理论上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研究推进了两种联盟分析路径的汇合。但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盟和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盟各自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归根到底是一个经验问题,理论模型只能提供有待经验检验的假设。正是通过对历史数据迄今为止最系统和最全面的检验,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在2001年出版的《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一书为两种联盟分析路径的汇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经验

James Alt and Michael Gillig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ing States: Factor Specificity,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effrey Frieden and David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p. 339.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基础。

在希斯考克斯看来,两种联盟分析路径都能够为自己找到在各种不同背景下的经验性证据,这就意味着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以确定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哪种解释方法更加合适。在该书中,希斯考克斯运用标准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沟通两者的方法,即关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程度。如果要素能够在不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那么贸易会对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使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立场不同,而不论他们处在哪个行业。如果要素在不同行业之间不能够自由流动,那么贸易就会对不同行业的收入有不同的影响,使得不同行业中同一要素的所有者在政策方向上立场不同。换言之,在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在要素流动程度低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相对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辨别不同形式的社会联盟之间的差异。希斯考克斯认为,“联盟”一词指的并不仅仅是一组拥有共同政策偏好的人;它还隐含了为影响政策制定而进行的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在民主政体中,政党、组织和游说集团就是联盟影响政策的主要组织渠道。比如,根据一般的政治学常识,政党往往代表了一定阶级(劳工、资本家或农场主)的利益。因此,贸易问题上的阶级分化越严重,政党内部就越团结。当政党代表稀缺要素所有者时,政党成员就一致地支持保护主义;当政党代表充裕要素时,政党成员就一致地支持自由贸易。而贸易问题上的行业分化越严重,政党内部的立场分歧就越严重。不同的选区而不是不同的政党会根据其所在地各个行业的重要程度来评估支持某项政策变革所获得的净收益。同理可以推出社会分化的类型对社会组织和行业集团行为的影响,如表-7所示。

Michael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于扬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同上书,第58页。

表-7 要素流动程度差异带来的预期结果

要素流动程度	联盟	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和组织的影响	对行业集团的影响
低	行业联盟	在贸易问题上内部分裂,采取模糊的政策立场	游说活动活跃,进口竞争行业争取保护,出口行业争取自由贸易
高	阶级联盟	在贸易问题上内部统一,采取一贯的保护主义立场(当代表稀缺要素时)或自由贸易立场(当代表充裕要素时)	不活跃

资料来源: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64页。

这样,希斯考克斯就提出了基本的变量关系: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的高低会影响由贸易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的类型。为了验证这一命题,他确定了显示这两个变量的指标。衡量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的指标包括:行业间的工资和利润率差异、人力资源流动率、工作年限、企业的研发收入。衡量社会分化类型的指标包括:政党成员对主要贸易议案的投票、在贸易政策立法和行政委员会上自愿做陈述的行业集团的数量和种类、关于贸易问题的民意调查数据。

在变量操作化的基础上,希斯考克斯给出了 19 至 20 世纪期间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六个国家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的系统性资料。他也研究了这些国家自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由贸易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分化,重点讨论了这些分化对政党和社会组织行为的影响,以及主要行业集团进行游说的效果。数据显示,根据变量关系所做出的预测与实际情况是基本相符的。此外,他还专门研究了 1824—1994 年美国国会针对贸易法规进行的投票表决,并对此间不断变化的社会分化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分析。统计结果也支持了他提出的命题。正如埃里克·莱因哈特(Eric Reinhardt)所评价的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于扬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1—22页。

同上书,第 65—68页。

Michael Hiscox,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Factor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ongressional Votes on Trade Legis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3, 2002.

那样：“希斯考克斯以多种方法对理论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实证检验，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他检验了多个国家在多个时期的情况，远远超越了所有这一领域先前的经验性研究工作。”

希斯考克斯的上述成果激发了政治学家对要素流动程度问题持续的研究兴趣。杰弗里·雷德韦格 (Jeffrey Ladewig) 在《国际组织》2006年冬季卷上发表了《国内因素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对美国 1963—1992年的要素流动程度与贸易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雷德韦格指出，对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要素流动程度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显示美国在这一时期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低，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高。为了解决这种分歧，雷德韦格使用了美国众议院投票名单和选区层次上经济人口统计的数据来检验要素流动程度的高低。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 60—70年代，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低，而在 80—90年代，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高。雷德韦格进而发现，要素流动程度与政党提供贸易政策的力量和政府分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由于要素流动程度的差异，部门路径更适合于解释 60—70年代的贸易政治，而要素（阶级）路径更适合于解释 80—90年代的贸易政治。

四、社会联盟理论的价值、局限与启示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前夕，1028名经济学家（相当于那一时期美国所有的职业经济学家的总和）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联名请愿书以反对国会提高关税。77年之后，即 2007年的 8月 1日，针对美国国会中日益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同样由 1028名顶尖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以“建议立法当局不要通过限制对华贸易的法令”。签名的经济学家来自全美 50个州，其中包括 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发起这一请愿活动的增长俱乐部主席帕特里克·图米指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打击这种危险的保护主义倾向，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第 7页。

Jeffrey Ladewig, “Domestic Influenc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Factor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3 to 199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Ibid, p. 93.

并且通过行动向外界证明,知名经济学家们是一边倒地支持自由贸易的。”

从1930年至今,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信仰没有改变,自由贸易在政策实践中引发政治纷争这一关联性也没有改变。毋庸置疑,战后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业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贸易自由化的拉动下,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变得日益开放,国内政治也由于这一进程愈发暴露在国际化的压力下。正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和基欧汉所说,“由于政治和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期待会发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尤其是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应该体现出世界经济的影响。”以要素国际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为基点,社会联盟理论为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路径。这一学理上的贡献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肯定。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学者在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的学术进展时曾指出:“他们提出了一个简约的一般性理论,将世界经济与国内利益集团和政策联系起来。他们的理论框架不要具体的背景知识,可以用于任何政治体制。”如果说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学科区分已经不合时宜,那么社会联盟理论为打破这一区分则做出了“范式转变”意义上的贡献。

作为与政治学比邻而居的学科,经济学在略早的时期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范式转变”,即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创立突破了传统上以国内经济为取向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其主要开创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1963年发表的《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提出了前文述及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该模型第一次指出了各种经济稳定政策的效率依赖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从而根本改变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经济政策效率的传统视角。这样,作为国家经济的开放性程度

新华网专访:《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齐声说“不”》,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8/09/content_6500305.htm.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0页。

Robert Mundell,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1963.

除了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以外,货币危机模型和最优货币区理论也是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果。

日益加深的理论回应,开放宏观经济学和社会联盟理论分别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的国内后果。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分析国际要素流动对国内经济政策效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社会联盟理论则为分析国际要素流动对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提供了研究路径。就此而言,探索开放条件下的政治经济互动有可能成为全球化条件下政治学 and 经济学走向汇合的一个重要方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生成。

当然,作为一种相对简约的社会科学理论,社会联盟理论也有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如前所述,社会联盟理论所研究的重心在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作为这一研究议程的开拓者,古洛维奇在《颠倒的第二意象》中曾提出探讨以下问题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第一,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第二,在社会内部,谁会从政策中受益?谁支持政策?谁反对政策?第三,谁定义政策的备选方案?第四,政策如何合法化?什么因素使政策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社会联盟理论经过30年来的发展,在前两个问题的探讨上已经积累了诸多堪称经典的研究成果,但对后两个问题的探讨却乏善可陈。也就是说,社会联盟理论更多地揭示了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了国内政治分化,但没有解释政治分化的政策结果。古洛维奇在《艰难时代的政治》中虽然对三次危机下政治冲突的结果有过详细的叙述,但每次冲突的结果似乎都有其特殊性,从而难以找到明确的因果逻辑。罗戈斯基在《贸易与联盟》一书中则明确承认,他无法说明政治冲突的结果:“由于贸易而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集团可能在政治上取得相当长时期的胜利。因此我这里关注的只是社会分化而不是结果。”在罗戈斯基看来,胜利或失败既取决于集团的相对规模,也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特点,而后者尤其为社会联盟理论所忽略。弗里登也提出,他的分析并不必然和集团间政治冲突的结果相联系,因为政治和政策结果取决于偏好强度、不同利益集团的集中和组织程度以及政治和其他社会制度影响他们互动的程度。正是由于对这些方面的有意忽略,特别是没有将国内制度结构整合进入他们的

Grou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p. 906—907.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20.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 450.

分析框架,社会联盟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上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可能由于意识到这一局限,希斯考克斯提出,下一步应该分析社会分化和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形成贸易政治模式的。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社会联盟理论由于过于关注社会内部的分化,忽视了国家相对于社会所具有的自主性。正如西达·斯考切波所提出的,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战斗的场所,也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要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在这种国家主义的视野下,“国家被看作是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即使没有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持,甚至面对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对,国家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对外政策领域,国家行为体更有可能脱离社会的限制,比如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来减少乃至消除社会行为体的掣肘。除了古洛维奇等少数学者外,社会联盟理论的倡导者大都将国家看作政策输入—输出的转换器,在其政策分析中缺失了国家这个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核心要素。即使是古洛维奇,对国家的分析也主要是强调政治家个人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而没有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加以对待。这一局限不可避免的缩小了社会联盟理论的解释范围。例如,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进行的出口管制,就无法从社会内部的分化来解释。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内生贸易理论将政府和社会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上的互动加以模型化,从而为更全面地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辟了一条道路。内生贸易政策模型之所以叫做“内生”,是因为这种模型将贸易政策的形

阿尔特和吉利根等学者对国内制度与社会联盟形式的关系做过一些探索,但无论在逻辑论证上还是在经验支持上都很不成熟。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第11页。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0页。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a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田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成看作是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博弈均衡的结果。1994年,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提出的“保护待售”模型包含了政府、利益集团和消费者三个要素,使得该模型相比之前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更加全面。“保护”是指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提供对利益集团的保护,“待售”则是指这种贸易政策是通过各个利益集团参加拍买提供报价,然后政府根据自身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得出来的,因此,整个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政府对于贸易政策的“保护”的“待售”。正如前文所介绍的,国际经济学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为社会联盟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如果社会联盟理论再从内生贸易政策模型中汲取相应的学理资源,我们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解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尽管社会联盟理论并没有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描绘一幅完整的图景,我们依然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来推进与对外经济政策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笔者看来,社会联盟理论至少提供了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对外经济政策从来不是纯经济理论的产物,而是具有复杂的政治动因与政治逻辑的活动。我们可以运用揭示这一政治动因与政治逻辑的社会联盟理论,穿透各国贸易政治、货币政治和对外投资政治的重重迷雾,找到这些政治经济现象背后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基于利益分配格局而形成的社会联盟。比如,近年中美两国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摩擦与冲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美国1028名经济学家向国会联名请愿的一幕。与社会联盟理论的理论预测相吻合的是,国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明显跨越了党派的界限。为了达到各自的利益目标,美国主要行业集团竞相向立法和行政机构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业集团主要是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而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则反对人民币升值。华尔街银行金融集团为打开中国资本市场而利用了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从其本身利益而言并不希

其他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包括直接民主方法、关税形成函数、政治支持函数和政治竞争模型等。“保护待售”模型在总结上述模型的特点与分析其缺陷的基础上超越了上述模型,成为内生贸易政策模型中的集大成者。

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Protection for Sale”,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1994.

望看到人民币升值。中国可以据此把握美国贸易政治与货币政治的复杂性,缓解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作为“市场维护型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国在对外经济政策的机制与过程上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对政府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是隐性的、边际的,但它们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着某种制约作用。王逸舟认为,公众参与已给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带来了许多变化和进步,随着市场经济与公民意识的发展,中国外交会受到市民社会日益强大的影响。相对于国际安全事务这样的“高政治”领域,中国社会集团对国际经济关系这样的“低政治”领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经济,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际要素流动导致的国内利益分化。正如谢淑丽(Susan Shirk)的研究所揭示的,一旦邓小平率先开放中国经济,国内强大的积极反响证实了国际化对地方集团的偏好及其行为的强大影响。支持改革的联盟的核心正是在国际竞争中拥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即农业、轻工业和沿海省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在不断扩大,从国际经济联系中获益的民众也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流,从而形成了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显著支持。当然,作为参与全球经济的代价,中国经济体系的开放也会对国内的某些社会集团造成损害。如何对其进行利益补偿将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社会联盟理论为我们分析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提供了一种侧重于政治内涵的理论工具。

其次,国际经济联系带来了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治分化,这种分化既可能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也可能是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正如《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立法过程所反映的,以行业/部门为基础的政治活动更可能代表了狭隘的小集团利益。曼瑟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333页。

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220页。

卢春龙、田野:《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强度与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

胀和社会僵化》中曾提出,吸纳了大量社会成员的相容性组织不仅有动力考虑其政策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而且出于更具生产性社会的利益会与其他组织集团讨价还价,而狭隘利益集团通常没有动力这样做。政治分化的基础如果从相对狭隘的行业、部门向更为包容的阶级转变,可以减少分利集团的政治影响,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希斯考克斯据此认为:“如果能够通过提供效率加强型的经济政策和补偿方法来在广泛的阶级联盟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调解模式,那么阶级分化将更吸引人。”根据社会联盟理论,如果提高要素流动程度,就可以抑制以行业、部门为基础的政治分化。实际上,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正是建立了包括培训补助、搬迁补助和资本重置补助在内的调整辅助系统,使国内的企业和工人得以通过非政治的方式来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就此而言,“北欧模式”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与示范价值。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为管理相互依赖建立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金融机制,比如 GATT/WTO、MF。这些国际制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制约了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了国家间交易成本,有利于国家达成相互获益的国际协议。但随着这些国际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民主赤字”问题也日益凸现。正如基欧汉所指出的:“规则不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自己的事情。私人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的下属单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跨国和跨政府网络也都发挥了作用。任何可持续的治理模式都不得不将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内部的全体选民之间的联系渠道加以制度化。”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保证这些国际制度的国内合法性,将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挑战。正是在这一方面,社会联盟理论指明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支持模式。弗里登就曾发现,与海外经济状况更相关的社会行为体宁可在很大程度上牺牲国家政策的自主性,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8页。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第8页。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41.

也愿意选择更具协调性的对外经济政策。希斯考克斯在新近的研究中则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由于接触到的经济观念和比较多,更可能支持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在国际制度的设计上如何考虑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将是未来国际经济合作中不得不应对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国际制度理论可以和社会联盟理论形成联姻,共同携手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建设。

www.cnki.net

Frieden, "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 p. 450.

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Hiscox, " Learning to Love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2006; Michael Hiscox, " Through a Glass and Darkly: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Curious Effects of Issue Framing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3, 2006.

作者简介

聂军 襄樊学院政治与法学系副教授。200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fniejun@126.com

王海滨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wang-hb05@mails.tsinghua.edu.cn

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年、2001年和2004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年)。

电子信箱: tianye@ruc.edu.cn

孙学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1997年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分别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7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合著,2005年)。

电子信箱: sunxuefeng@mail.tsinghua.edu.cn

杨子潇 清华大学中文系2004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youngzshower@gmail.com

陈小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2005年在兰州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2007年在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xiaoding@mail.nankai.edu.cn

周方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2001年)、《东亚安全合作》(合编,2004年)。

电子信箱: zhoufangyin@gmail.com